

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

李 零 (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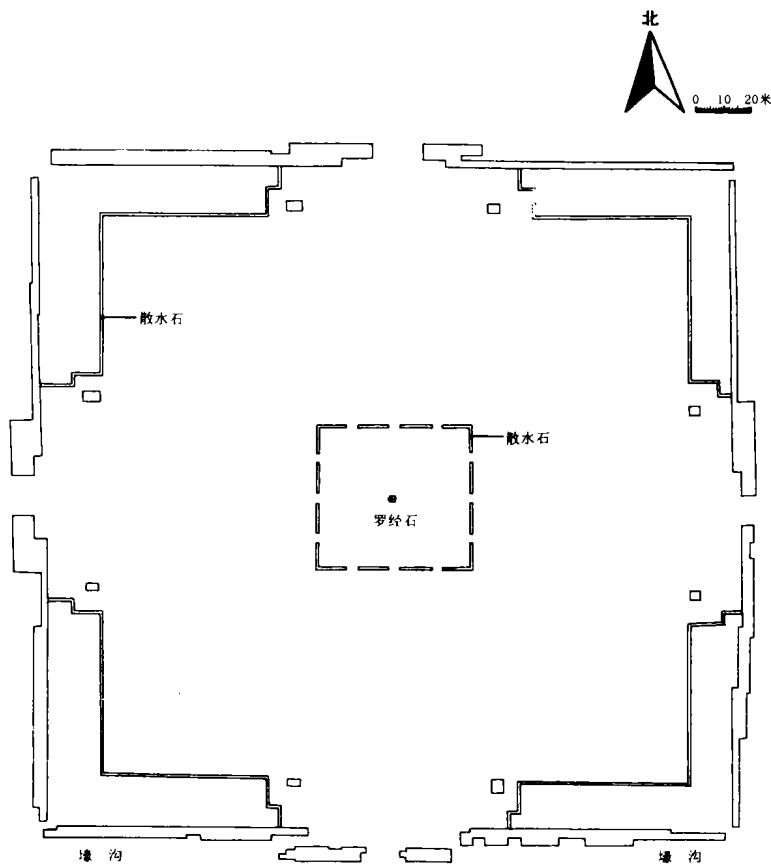
前不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考古系演讲,向我们系统介绍了西汉帝陵的发掘与研究,其中重点是讲该所近年来发掘汉阳陵的重大收获,使我学到不少东西。嗣后,曹玮先生给我寄来该所新编出版记载这一发现的精美图录:《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

年),并向我解释了图录中的某些细节,使我对他们的工作有进一步了解。我对其中的“罗经石”遗址兴趣最浓,这里不揣浅陋,讲一点读后的感想。

此书发表的材料是:

(一)“罗经石”遗址^①。

(1)“罗经石”遗址平面图
(图一)



从图上看,遗址是作“回”字形,即采取大方套小方的形式。外方是院墙,形状是正方形,墙外有壕沟,四正(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有四门,四门之间是四个曲尺形回廊,回廊前面有散水,两端各有一口井,正好在门内的两侧,一共有八口井。内方是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形状也是正方形,外边也有一圈散水,四面各有三个门,共十二门,门内未发掘,情况不明,中心是“罗经石”。

(2)“罗经石”与帝、后二陵
(图二)

从图上看,“罗经石”的位置正好是在汉景帝陵和王皇后陵的中间,整个石刻是上圆下方,类似式盘,上面凸起的一层是圆形,中间有十字交叉的刻槽,类似式盘的天盘。下面的基座是方形,东边比较完整,西边已经残缺,则类似

图一 “罗经石”遗址平面图



图二 “罗经石”与帝、后二陵



图三 青龙纹和玄武纹空心砖

式盘的地盘 据曹玮先生告,其地面上方砖是后来加铺,起保护作用,不是原来的地砖

(3) “罗经石”

据图版说明,此物位于汉景帝陵南约 450 直径 1.4 米,中心刻有“十字凹槽”,标志正南正北和正东正西

(二) 有关出土物

(1) 带瓦当筒瓦

长 48 瓦当面积 17.3 平方厘米
当面文字:“长生无极”。

(2) 青龙纹空心砖 (图三: 上)

残长 53 宽 35 厘米

(3) 玄武 (龟蛇缠绕) 纹空心砖

(图三: 下)

残长 52 宽 34 厘米

(4) “长乐未央”文字瓦当

面积 16.5 厘米。^②

另外,最近我还读过马永赢 王保平先生写的《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该书对上述材料也有介绍,但有些数据不太一样。它提到:

(1) 此遗址是位于汉景帝陵东南约 300 米处 (《汉阳陵》作 450 米);

(2) 遗址总面积约为 67000 平方米;

(3) 外围基址的边长是 26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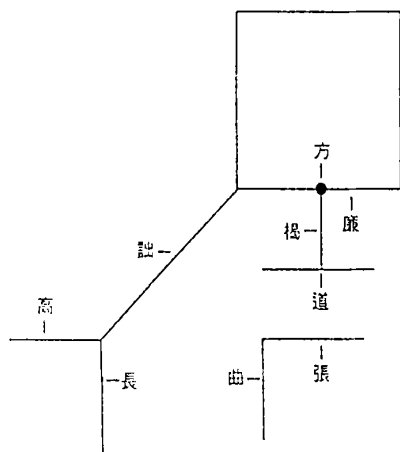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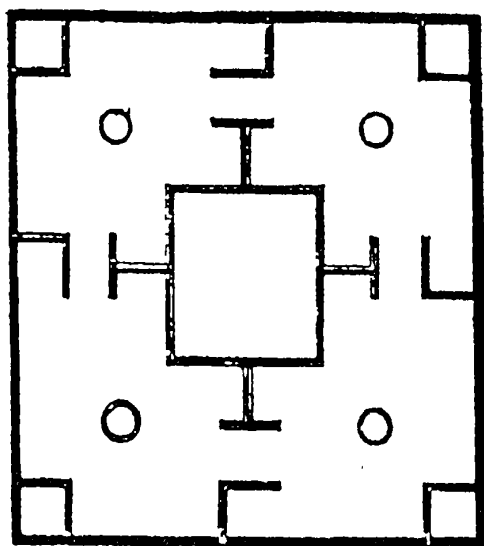
(4) 四隅回廊的边长是 60 米;

(5) 遗址中部夯土台的边长是 54 米;

(6) “罗经石”,上面的圆盘直径 1.35 米 (《汉阳陵》作 1.4 米),底座边长 1.7 厚 0.4 米,圆盘上的凹槽宽 3 深 2 厘米

(7) 在“罗经石”以东 250 米处,王皇后陵的正南还有一处汉代建筑遗址

(8) 其外墙之内,四隅回廊和中心建筑之间是砖铺地面,四灵纹砖就是发现于这一范围内。



图四 汉六博局及其术语

二

从现已发表的遗址平面图看，我的印象是：

(一) 它和汉代博局 (图四: 上) 的设计有类似之处。

汉代六博是一种按宇宙模式设计棋局 (与棋盘类似, 也有四方八位九宫十二度一类设计), 并按历术推算设计行棋 (即按六十甲子的循环来行棋) 的游戏^③。它的棋局是由大小两个方块组成, 内外两个方块之间各有五组符号、九个术语 (图四: 下):

(1) 内方。其四条边的平分点叫“方” (可能指四正, 即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个方向), 四条边叫“廉”或“畔” (这两个字都有边缘的意思)^④, 前者当后者之半, 穿过它的平分线是与后者垂直。

(2) 内方外缘 有四个 T 形符号 (或矩形符号), 从四“方”向外伸出, 其竖画叫“榻” (“榻”是竖立的木桩), 横画叫“道” (疑指横置的木杆)^⑤, 两者垂直。

(3) 外方内缘 有四个 T 形符号 (或矩形符号), 在外方的四正, 与内方四正的“榻”、“道”相对, 其横画叫“张” (疑指横陈), 竖画叫“曲” (或“究”, “曲”是曲折之义, “究”可读“勾”, 含义相同), 两者亦垂直, 其夹角平分线与“拙”垂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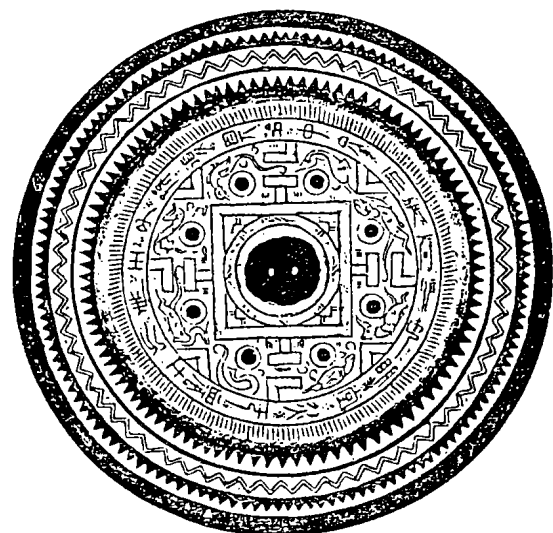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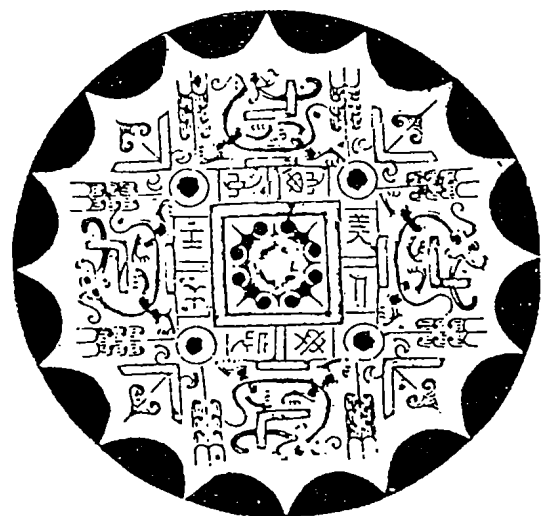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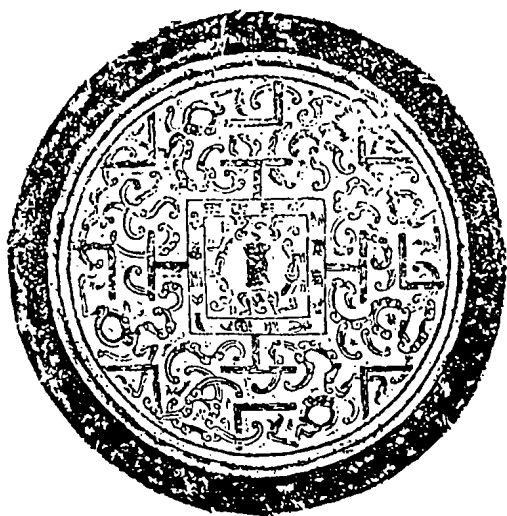
(4) 四角与内方之间。有四道连线, 叫“拙” (或“屈”, 含义待考)^⑥。出土博局除这种形式, 有时也用四个小圈, 或四个小鸟, 或四朵小花来表示。

(5) 四角 有四个 V 形符号 (或规形符号), 其右边一笔叫“长”或“玄” (“长”与“玄”含义相近, 都有长、远之义), 左边一笔叫“高” (“高”与“长”含义也相近, “长”指横广, “高”指竖高)。

与博局的设计相似, “罗经石”遗址也有内外二方。其内方十二门相当博局的“方”、“廉” (内方) 和“榻”、“道” (四 T), 外方四门相当博局的“张”、“曲” (四 L), 外方八井相当博局的四“拙”, 外方四廊相当博局的“长”、“高” (四 V, 但方向相反)。

第二, 它更接近汉代博局镜的设计。

汉代的博局镜 (旧称“规矩镜”或“TLV 镜”, 今名“博局镜”) 是模仿博局的设计而制造^⑦。不同点是, 它是把方形的博局纳入圆形的镜背, 外面套了个圆圈。中国的镜子是以圆形为主, 它和式盘不同, 不是大方 (地盘) 小圆 (天盘) 而是大圆 (镜缘) 小方 (博局)。博局的外方是被外面的圆圈遮盖, 看不见四边, 四隅的 V 形符号也内收, 以迁就外面的圆圈; 其四隅连线多用四乳或八乳来表示, 环绕内方, 构成一个潜在的方形或圆圈。内方往往含有标注十二辰的十二乳, 指示四隅的四朵花 (花瓣的尖端指向四隅), 以及用来



图五 汉代经博局镜

穿系组绶的鼻纽 镜纽居中，也是一个突起的乳状物，它和周围的八乳，构成此类铜镜铭文常说的“八子九孙居中央”^⑧。博局镜的出现很早，如河北满城窦绾墓（葬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 年〉后不久）出土的“大乐富贵”镜就是其中较早的例子（图五：上）^⑨。西汉铜镜流行“花瓣纹”和“草叶纹”，其主体特征不在“花瓣”和“草叶”，而在四方八位九宫十二度一类设计，有些还标有博局使用的符号（图五：中），很明显是博局纹的变形^⑩。它说明，这类设计在西汉时期已经流行。但博局镜最典型的形式，主要还是流行于王莽以来，王莽镜铭每言兴建明堂、辟雍（两者是同一组建筑）之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镜，其铭文就有“新兴辟雍建明堂”这样的话（图五：下）^⑪。我们怀疑，它不仅是记录这件制礼作乐的大事，而且也是以铜镜的图案来象征明堂、辟雍。所以它不但与上述六博棋局的设计有关，也与下述王莽明堂的设计有关，而且与后者更为接近，其实也可视为明堂式的设计。与博局镜的设计相似，“罗经石”遗址，其外方四门是相当博局镜的“张”、“曲”（四 L），外方四廊是相当博局镜的“长”、“高”（四 V，虽方向相反），外方八井是相当博局镜的八乳（在外方），内方十二门是相当博局镜的十二乳（在内方），中心的“罗经石”是相当博局镜的镜纽。

第三，它和王莽明堂（图六）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王莽明堂（即上面提到的明堂、辟雍），是 1956 年发现，1957 年发掘^⑫。地点在汉长安城遗址南约 1 公里，与《三辅黄图》、《水经注》等古书的记载基本吻合，可以确认就是汉平帝元始四年（4 年）王莽奏立的明堂、辟雍（《汉书》的《平帝纪》和《王莽传》）这一遗址是作外圆内方：外面一层是外圆内方，里面一层也是外圆内方。它的外层建筑（即辟雍），外面是圆形的“环水沟”，里面是方形的院墙。院墙有东、南、西、北四门。院内的四隅有四个“曲尺形配房”。“配房”的夹角里各有一口井（从对称关系看，原来应有四口井，但现在只有西南角的一口还在，其他三口因遗址被破坏，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外面一层。里面的中心建筑也是外圆内方。外圆是台基，内方是建筑。它的建筑设计，从复原图（图七）看，和

上面提到的博局镜很相似，也有四方八位九宫十二度的设计在内。东汉应劭对王莽明堂的形式曾有所描述。他说，“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辟雍者，象璧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汉书·平帝纪》注），就是形容长安城南的王莽明堂。可见它体现的也是一种宇宙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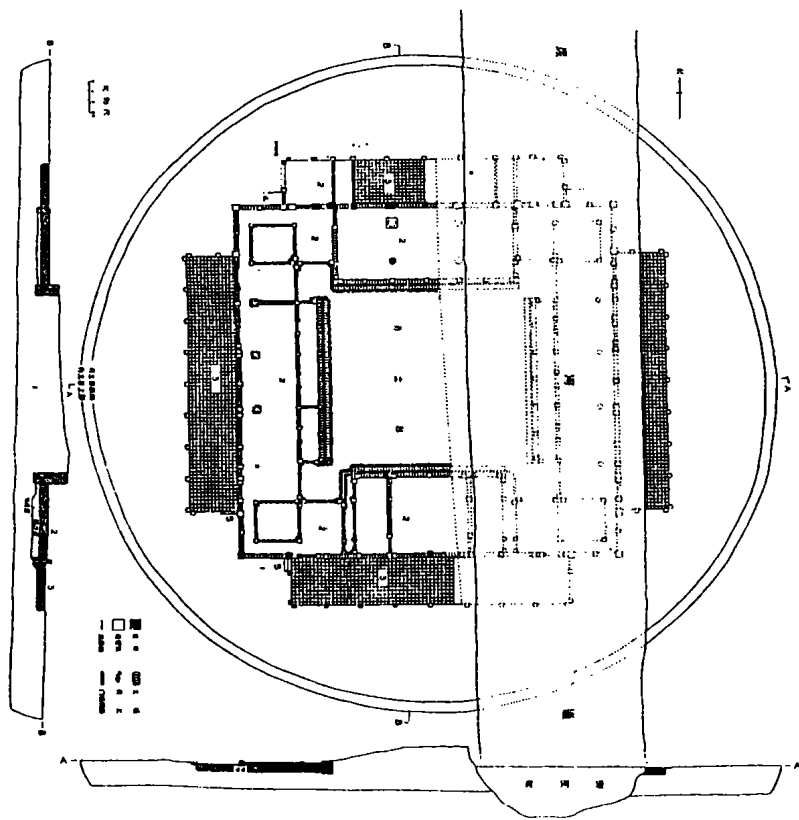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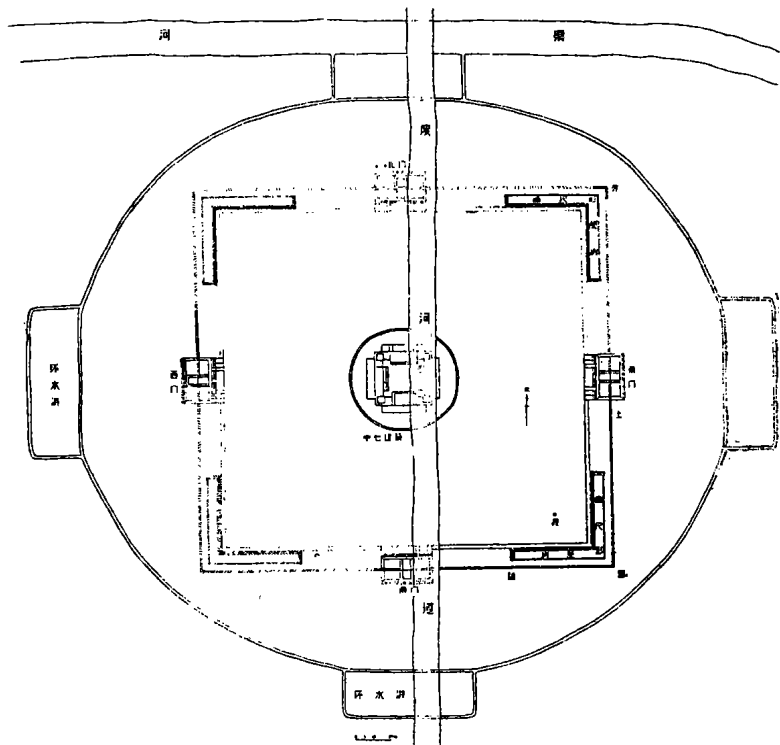
与王莽明堂的设计相比，“罗经石”遗址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太一样，但总体设计还是非常接近。如：

(1) “罗经石”遗址没有圆圈状的“环水沟”（后者更接近博局镜的设计，博局镜是王莽时的设计，当然比较接近），但它的外墙也有壕沟环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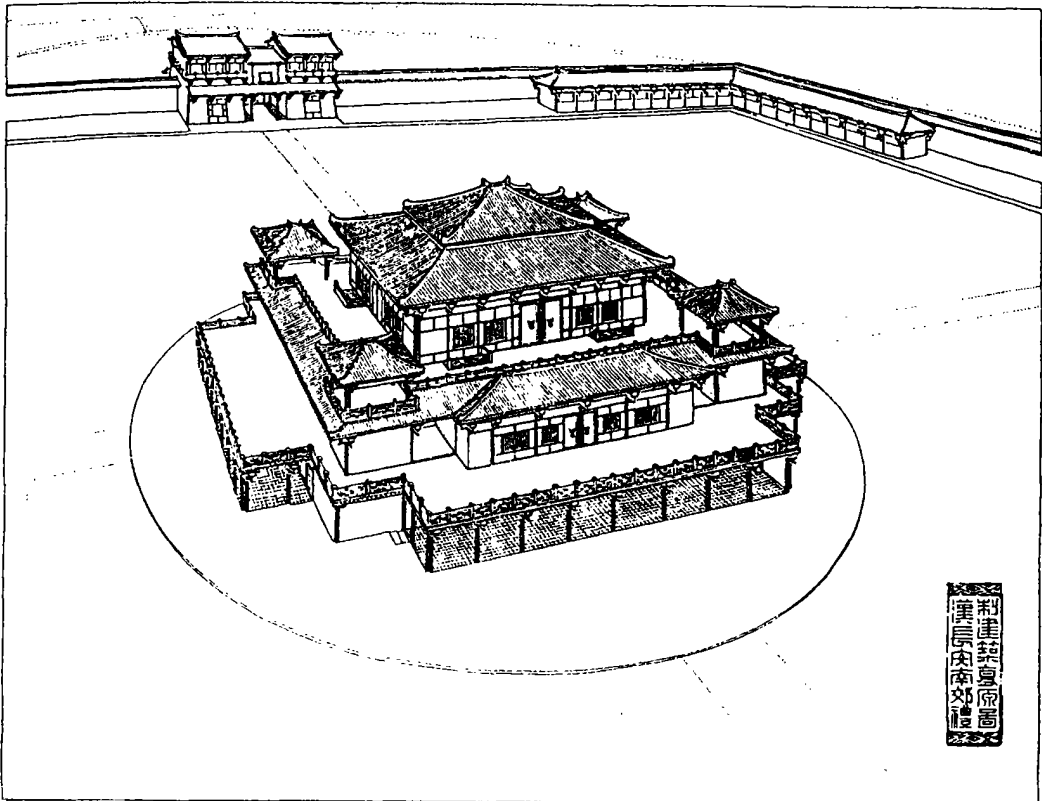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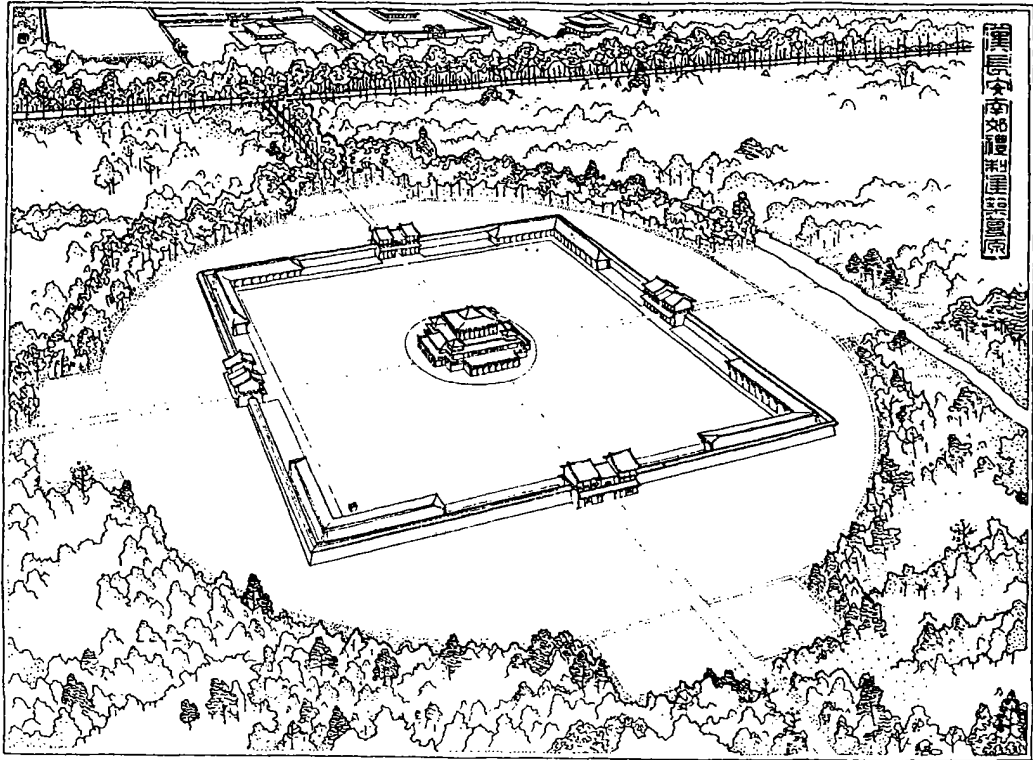
(2) 它的回廓比王莽明堂在遗址中的比例大，但形状大体相同。

(3) 它以八井夹四门，而非四井当隅，和王莽明堂也有区别，但正像博局镜可以八乳代四乳，八乳、四乳都是表示四隅，八井和四井的功能是一样的。

(4) 它的中心建筑



图六 王莽明堂平面图



图七 王莽明堂复原图



图八 王莽明堂出土的四灵纹瓦当

有十二门，王莽明堂的中心建筑也有“十二重”。

(5) 它出土了四灵纹空心砖 (只有南、北二灵发现)，王莽明堂的也出土过四灵纹瓦当 (图八)。这些瓦当估计是分四出四门，代表天宇的四宫二十八宿

从以上对比，我们可以说，“罗经石”遗址的设计是一种“博局式的设计”或“明堂式的设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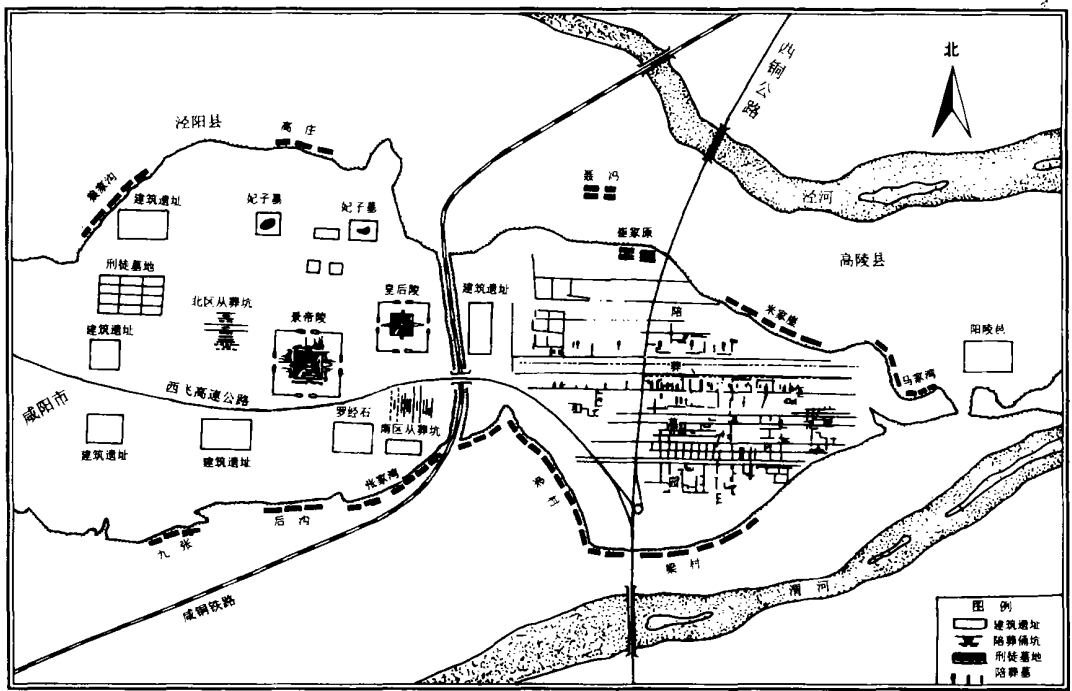
关于“罗经石”遗址的性质，我想大家都同意，它是一座大型的礼仪性建筑。但这座建筑到底属于哪一种礼仪性建筑，恐怕还值得探讨。据《走近汉阳陵》一书介绍。在阳陵附近，除“罗经石”遗址，还有一座礼仪性建筑，是位于“罗经石”遗址以东 250 米，王皇后陵正南 (图九)。作者认为，“这两处遗址或为阳陵陵庙、寝殿之类的礼制性建筑遗址”，这是更进一步的估计。但它们是“庙”是“寝”，仍有进一步确定的必要。过去，杨宽先生曾指出，汉自惠帝以来实行在陵侧起寝，陵前起庙，就近供奉，以时祭祀的制度。“寝” (包括正寝和便殿) 与陵墓最近，供“日上四时” (每天四次供奉食品)；外面有围墙，则叫“寝

园”；“寝园”有四门，叫“司马门”；“寝园”外有“庙”，则用来“月祭”，每年二十五次^⑥。他说：“西汉诸帝陵墓的‘寝’究在何处，还待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汉陵园中的‘寝’即使不在陵墓的顶上，必然也在陵墓的边侧，在陵园之内。它和陵园以外的‘庙’有一段距离，有一条通道叫作‘衣冠所出游道’，或者简称‘衣冠道’是由太常负责管理的”。按他的看法，“罗经石”遗址就是汉景帝在陵前修立的陵庙，即《史记·孝景本纪》记载的“德阳宫”^⑦。现在，阳陵遗址被揭露，在寝园四隅发现四处建筑基址，估计就是属于“寝” (图一〇)。寝园外的两处建筑基址，杨先生说“罗经石”遗址就是“德阳庙”，这确有很大可能，但另一座建筑的性质也还值得研究 (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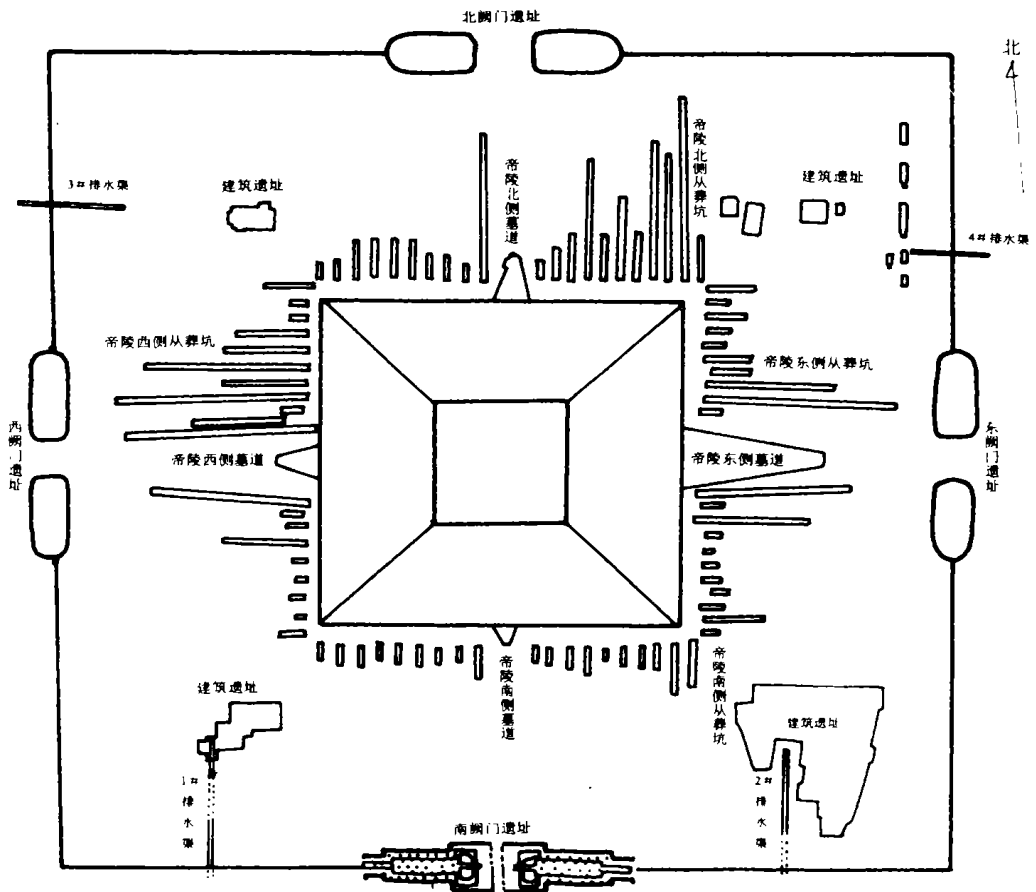
外，从图九我们还注意到，阳陵东西两侧还有其它五座建筑遗址，它们的性质也值得研究) 至于“罗经石”本身，过去多以为，它是用来定向定位，类似现代测绘表示测量基点的标示物。现在看来，恐怕应结合整个建筑的设计，即其模仿宇宙模型的含义来理解。既然该物从形制上看，与式盘相似，我怀疑，它也许是一个微型的宇宙象征物，放在遗址中心，可能是代表天极或太一。当然，这仅仅是推测。

西汉的陵庙是什么形式，现在还缺乏旁证，我们只能就遗址本身试作探讨，特别是就它与明堂制度的关系进行探讨。

明堂之制，古书颇有异说 (《逸周书·明堂》《大戴礼·盛德记》《礼记·月令》《考工记》《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其设计方案虽有不同，但差异只在四堂、五室、八房、八个的高广、结构和配置，基本构思还是一样的 (图一一)。它和一般宫室不同，不是作长方形，而是作正方形；不是独体的建筑，而是把若干结构相同的建筑，按方位对称的形式 (四方八位九宫十二度) 盖在一起，由此组成复合建筑。它的性质也很明确，其实是属于“宗祀配天之所” (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五《明堂礼通故》)。它是以祖宗与五帝配祭，行禘、祫之礼的建筑，当然要模仿五帝所居的天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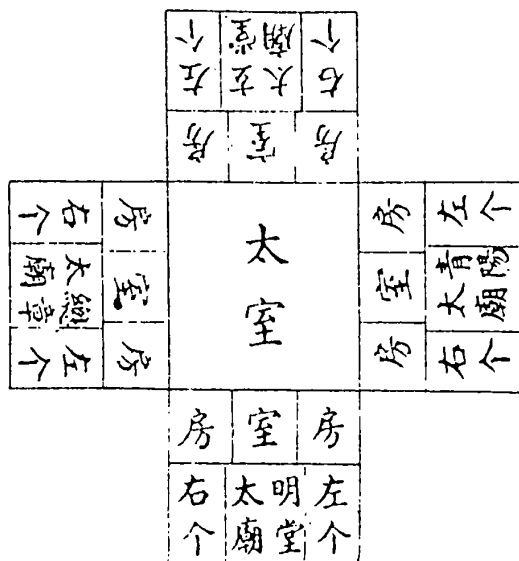


图九 阳陵区遗址分布图



图一〇 帝陵平面图

明 堂 圖



图一— 明堂图 (王维国《明堂庙寝通考》附)

因此具有宇宙模型的性质。汉代明堂是本先秦所传而附会之，虽有新的附会和想象，但设计思想还是差不多。史书记载，汉代议立明堂，都是由齐鲁儒生倡议。早在汉文帝时，贾山就已上书，建议“以夏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汉书·贾山传》引贾山《至言》），当时文帝好黄老刑名，未能实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武帝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赵绾、王臧以文学为公卿，再劝武帝在长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他们是鲁国专治《诗经》的专家申公（申培）的学生。为修明堂，武帝曾派人恭请申公到长安议事，会褒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将绾、臧下狱，二人自杀，所议皆废（《史记》的《孝武本纪》和《儒林列传》）。第三次是汉武帝封禅泰山后（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泰山东北脚见到一座古明堂，使他再度兴奋，所以第二年，在泰山脚下修了“汶上明堂”⁶。它是由济南儒生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按这个图，在泰山脚下的奉高修建。其祭祀对象包括：太一、五帝、后土、高祖。太一、五帝在“上坐”，高祖祠在太一、五帝的对面，后土在“下房”（《孝武本纪》），同时兼有泰（祭天和太一）、后土祠（祭地和后土）、雍五（祭五帝）和高庙（祭高祖）的祭祀对象（案：这四组祠庙是西汉最重要的礼仪建筑），是一种综合性的礼仪建筑。其建筑特点，据

公玉带的《黄帝时明堂图》，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孝武本纪》），《史记索隐》说“昆仑”之名是因模仿昆仑山的“五城十二楼”（案：细揣文义，“昆仑”是指建筑总体，而非“从西南入”的圜宫复道）。我们估计，它是一种东、南、西、北、中“五城”，四面各三楼，共“十二楼”的复合建筑。汉武曾多次在汶上明堂举行祭祀，祭汉高祖（配上帝即五帝而祭），但也包括他的父亲汉景帝（《孝武本纪》）。这是武帝明堂，现在还没有发现。50年代发现的王莽明堂，是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由刘歆等人所治，它是修在汉长安城的南郊，和武帝即位初年赵绾、王臧的建议相同。赵绾、王臧的考虑是本之儒家经典的旧说，和王莽对经典的理解一致。王莽当政时期，他的重大举措是对武帝以来的祠（有700多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削减数量，收远为近。他不但把散处三辅和三辅以外的郊祀之所统统废除，删繁就简，改置于长安四郊，而且把明堂之祭也搬到长安，这不是孤立的考虑，而是来自他的全盘设想。这组建筑虽作于西汉末年，但其设计思想却非常古老，不但可能上溯到武帝时期，而且还有更早的来源。

古代陵墓，有把墓室称为“玄堂”的说法。如古书常说“梓宫之里，玄堂之内”（《魏书·皇后列传》）。“玄堂”是死人所居，按明堂制度，是其北堂的别名。陵庙在其南，和它相对，则是其后人“事死如事生”，在陵前祭祀的地方，按明堂制度，是相当其南堂，即狭义的“明堂”。古人以北为阴，以南为阳；以北为刑，以南为德。汉景帝的陵庙叫“德阳庙”，会不会是以方位居南而命名，这很耐人寻味。

另外，“罗经石”遗址，其形制类似王莽明堂，但年代却比后者早得多，这也很有意思。《孝武本纪》说，武帝立汶上明堂后，不但在那里祭过高祖，也祭过惠帝。可见明堂与宗庙有一定关系。会不会在武帝以前，人们就已接触到某种“明堂式的设计”（上文提到，文帝时贾山已经提出修立明堂），并且已经把它应用于早期的宗庙，包括陵庙？或者汉景帝的陵庙会是不是武帝所修，它所体现的正是武帝热衷的“明堂式设计”？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 问题的答案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2002年3月11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补记: 承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钟晓青先生告, 她本人和付熹年先生均认为“罗经石”可能是建筑中心的柱础石, 录此备考。

李零

2002年7月7日

注 释

- ① 为了方便印刷, 本文的图一至图三是采自《走进汉阳陵》一书的黑白插图, 而不是采自《汉阳陵》一书的彩色图版。
- ② 据焦南峰先生介绍, 阳陵还出土过一些陶制的六博盘和围棋盘, 其中也有在“罗经石”遗址发现的。参看图版二二三六所收王皇后陵寝园出土的六博盘(边长34.5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 其四隅是用X形符号表示, 图录未收“罗经石”遗址所出。
- ③ 李零:《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中国文物》,待刊。
- ④ 《广雅·释言》:“廉, 棱也。”《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 郑玄注:“侧曰廉。”《说文》卷十三下田部:“畔, 田界也。”也有侧边之义。
- ⑤ “道”, 疑读“樛”, 《说文》卷六上木部:“樛, 断木也。”
- ⑥ 这两个字都是“盈”的反义词。
- ⑦ 熊传新:《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文物》1979年4期, 35页;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1期, 21-42页;西田守夫《‘方格

规矩镜’の义纹の系谱》, Museum, no. 427(东京国立美术馆美术志, 1986年10月号), PP. 28-35页;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12期, 1116-1118页。

- ⑧ 规矩镜的镜乳, 早期是以四乳为主, 晚期是以八乳为主, 但也有作五乳, 六乳和七乳者, 并且有些镜子, 除外方八乳, 还有内方十二乳。镜乳数量不同, 铭文也不同, 如七乳镜会作“七子八孙居中央”, 八乳镜会作“八子九孙居中央”, 外八乳、内十二乳者会作“八子十二孙居中央”。它们的含义都是属于“长宜子孙”的范。参看: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 1992年)266(八乳镜)、278(八乳镜)、293(外八乳, 内十二乳镜)、349(七乳镜)页。

- ⑨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 169页。案:170页的日光博局蟠螭镜也是西汉博局镜(湖南长沙西汉晚期墓出土)。
- ⑩ 《中国铜镜图典》, 203-206页。
- ⑪ 《中国铜镜图典》, 274页。案:313页的始建国二年禽兽简化博局镜也提到“更作辟雍治校官”, 323页的新兴几何纹简化博局镜也提到“新兴辟雍建明堂”。
- ⑫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45-55页;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36-39页;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53-58转52页。
- ⑬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16-22 176-181页。
- ⑭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16-19 179页。
- ⑮ 据《汉书·地理志上》, 武帝在琅邪郡的不其县也修有明堂。

(责任编辑 宋远茹)

On the Architectural Plan of the " Stone of Compass" Site near the Mausoleum of Han Emperor Jing

(Abstract)

Li L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rchitectural plan of the so-called " Stone of Compass" Site of the Han Dynast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Mausoleum of Han Emperor Jing. Based on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ree points: First, the square building on the site is very similar to the design of the board of Liu Bo game tha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Han dynasty; Second, it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sign of the Han mirror with Liu Bo pattern; Third, this site has a similar layout to a famous ritual building, i. e. Wang Mang's Ming Tang Hall.

Finall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his site, and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be the Mausoleum Temple of Han Emperor Jing, i. e. De Yang Temple,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plan of the Ming Tang Hall before Emperor Jing and later Mausoleum temples.